



中国人的

智慧

[法] 谢和耐 著
Jacques Gernet
何高济 译

*L'Intelligence de
la Chine:*

Le Social et Le Mental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人的智慧

[法] 谢和耐 著

Jacques Gernet

何高济 译

*L'Intelligence de
la Chine
Le Social
et Le Mental*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智慧/(法)谢和耐著;何高济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0

(域外汉学名著译丛)

ISBN 7-5325-3703-X

I. 中... II. ①谢...②何... III. 思想史-中国-
古代-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1273 号

Jacques Gernet

L'Intelligence de la Chine:

Le Social et Le Mental

Gallimard

1994

域外汉学名著译丛

中国人的智慧

[法]谢和耐 著

何高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此书曾在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2 $\frac{8}{18}$ 插页 5 字数 181,000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7-5325-3703-X

B·430 定价: 2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 56628900 × 813

域外汉学名著译丛

常务编辑：李天纲 邹振环 张晓敏

赵昌平 胡礼忠 葛晓音(以姓氏笔画为序)

执行编辑：吕 健 秦志华

本书策划：李 申

本书责任编辑：黄晓峰

译者前言

这部书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论中国历史的文集，内容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宗教、思想等方面，可以说是谢氏研究中国史的结晶。在“社会和思想的历史”一节中，谢和耐回顾了1814年法兰西学院在欧洲设立第一个汉学讲座后法国汉学研究的进展，接着有如下的感想：

中国和日本的汉学家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有很大的优势……在这个领域，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而且我们不能比中日大学者做得更好，这一点是显然的事实。但是，如果不能从小到大生活在中国环境和语言中，接触一个伟大文化的历史遗产有很大的障碍，那么在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熏陶后，再去认识和观察这个东方世界，可能也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我们有我们看问题的方式，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肯定有其价值。

这是一番中肯的话，海外汉学家因条件关系，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无疑有一定局限性，但作为旁观者，用另一种视角去考察另一种独特的文化，往往能够凸显它的特征，揭示它不同的魅力。中西方无论在历史、文化的发展方面，都是极不相同的，用谢和耐自己的话说：二者没有什么相似的可比之处，而正是在这巨大的差异中，更有利于去做比较研究。我们看到，本书中始终贯串了这种研究方法，其中的一些成果必定对我们的研究有参考价值，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何高济于北京

2003年6月25日

中 译 本 序

我有幸得知我的文集已译为中文，谨表示我对译者的深深谢意。因为我知道法语是一种很难的语言。中文也很难，对外国人来说，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才能理解，特别它经历了若干世纪和千年的历史。中文著述是很多的，在各个领域内可用的史料取之不竭。按中国算法我现已 83 岁，一直在工作（目前正准备一部有关王船山哲学的著作，我认为他是一位值得仰慕的人物）。然而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刚刚开始，所知还不及应知十分之一的学生。如果，不管我在这部书里写作的错误，它仍能在中国引起兴趣，那么我将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按照中国的说法，请指教。

谢和耐

2003 年 10 月 2 日

导 言

这里收集了各种题目的文章。它们涉及到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思维方式和思想潮流。这是一次个人的行程,其中,开始的方向和特别的兴趣,以及外界鼓励都在起作用,这说明文章的多样性。

因为中国是那样遥远,人们既不认识它丰富的文化财富,也不知道在 45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它深刻的变化,所以有关它的研究在我们这里是一门特殊的学问。但在经历了漫长岁月后,中国和欧洲一样演变到今天。人们往往忘记了它真正的悠久历史和辽阔的土地。由于它的幅员、地区和语言的不同,中国在全亚洲所起到的及受到的影响,和我们欧洲没有什么可比之处。尽管中国的侯国在公元前 3 世纪末首次统一,而且中国还有好几次新的统一时期,人们仍太多地忘记它长期的混乱、分裂、部分或全部被异族占领的年代。这些年代绝不及统一之重要、有意义。每次重新统一,都是一个重建的新国家,与过去的全不相同。广大公众为我们感到自豪,认为中国一成不变,这个老调不过是无知的结果。

朝代的简单更替,历史的无谓重演,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发展的方向,蕴含着巨大的悲剧性;社会组织、制度、政治体系、观念经历了大转变;一个时代的人物不同于另一个时代的人物。然而,就那些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而论,没有一样触及要害:关键是中国没有出现西方发生的事,特别在近代,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没有商业资本主义,没有实验科学,没有机械化,因此中国的历史不能与西方相对比。早于谷登堡 6 个世纪,中国已能够重印书籍,其重要性是,它对国家和社会的演化和知识

的进步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它只是木刻术而不是印刷术;11世纪出现的中国摆轮天文钟,可以准确报时,在惠更斯(Huygens)之前没有匹敌,但中国的摆轮没有传给后代,而且不应叫这个名字,因为它是用水作动力,不是欧洲的类型。其余类推:在艺术、知识及思想领域,事情确实与我们的显得不同。按照过去的原则,西方表现出的成就,是唯一值得在社会和思想史中考虑的,而关系到中国的东西,在它历史经验上没有实际意义,但这种说法既排斥文化的相对性,也否认作为人类真正历史中文化的相互联系,没有中国我们就不是今天的我们。

中国不是东方,至少不是我们传统上用来称地中海东部和近东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与我们的距离上,在历史中与我们的密切关系上,不像中国那样遥远。与我们熟悉的这个东方相比,另一个可归入我们的欧亚大陆,即从太平洋到亚洲中心,从西伯利亚东部至印度群岛的地区,我们忘记了有关它的情况及其历史对我们是多么陌生。仅仅因这个理由,在世界这部分地区起过重大影响的中国,不止引起我们的好奇,同时对人类文明史的比较研究,对我们现代的序幕,都是有价值的。尽管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世界发生变化,远东各国仍然像我们一样深深扎根于它们的过去。

在这个领域内,没有料到开始会碰上那么多的困难。我们从小学习的东西没有相类似的,然后在研究过程中,一个对我们来说在各方面都陌生的文化,我们还缺乏有关的资料。除了缺乏许多必需的常识,我们不能理解一般的情况以及有关的著述,还遇到语言上的困难:中国文字随着历史演进,不断增加含义和形式;以致中国文人能够领会其意义的,我们往往看成是个死字。此外还存在更多问题,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没有全面研究、考察和分析那些重要年代以及重要典籍。无论中国历史,或浩若烟海的中国文献,只有一小部分是研究的对象,译成我们语言的就更加稀少。据可靠的估计,18世纪中叶前中国出版的书籍超过世界上其余地方所出版的总和,且不说还有取之不竭的碑铭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从根本上说,认识中国尚需作出巨

大努力。

因为我们是西方人，我们进行的研究都带有比较性质。然而，作这种比较研究是有益的。如果把中国的史料与我们世界经典的、中世纪及近代的史料作一番比较，可以看出，文化间的差异是不同历史路线的结果：在发展的某些时刻，采取的方向给文化指引应走的道路，而且往往是较好的道路。这样，我们看到，在中国，出现犹如抽象存在的国家、越来越精通的和集中的农业优势、最早的史料编纂传统、艺术形态和思维方式、奇特的文字，对习惯于使用简单字母的人来说似乎不必如此复杂。这一切，或至少主要方面，看来都是在公元前 5 和前 3 世纪之间大动乱时期决定的。

思想状态往往被认为具有普遍性，如现代人的思想、成年人的思想及西方的思想。对这种不引起问题的思想状态，我要提到有关的观念、意识乃至感觉都有一段历史，而整个人类是他们共同经验的产物。由此无疑需要进行探索，但不是没有益处的。游牧民族的饲养者，在时间、空间和人类行为的观念上，不同于定居的农业劳动者；中国的思想家，尽管有独创性，也不是按想像在写作，他们与我们一样，吸取了丰富的传统思想，并且借鉴于另一个思想世界；宗教信仰并不是某些人认为由意识产生的那种最初对来世的空虚渴望，它处处都反映社会、政治和独特思想的历史，以致信仰不仅是个人信念的事，而且人们所谓的精神性也不能和某些具体的现实相分开。在各种文化中，人类不断地成长和变化。

我认为有意义的是，人们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集体地行动，并且他们的行为是符合他们思想的。佛教徒继承的冥思方式，以及更早的道家，在我看来都对 11 世纪中国文人的天道观和道德论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果在某个时代，有人自愿裸葬或火殉，主动实践良心的审视，养成检查每人行为而结合的习惯，那么这些做法既不是无根据，也不是任意的。我们发现，同时代所具有的特点，都带有消失的古代痕迹。

一部书不必要都有一条主线。如果不管内容多样化，有一

条主线的话,那多半取决于作者的信念。但这些线索也可能是很微妙的,本书的线索则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宁愿采取和解而不是斗争方式,以及在思想领域中相信对立面互补观念的重要作用,认识世界的模式以及文字的类型,文学中的隐喻风格以及在实用占卜中如同数学演算、显而易见的直观规定方式……。在中国,文字是比说话更有分量的东西。学术思想,哲学的或数学的,都依靠图形和文字,依靠对笔画和字形的分析,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字。《易经》的卦是杰出思想家思考的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没有发现类似印度或罗马那种作为宗教即审判的唯一造物主,由他神圣地创造一切的故事。在社会和精神之间,可以由神秘的炼丹术织成一张关系网。

域外汉学名著译丛

已出、即出书目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

【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 48.00 元

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 45.00 元

清延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

【意】马国贤著(李天纲译) 25.00 元

中国人的智慧

【法】谢和耐著(何高济译) 26.00 元

中国社会史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即出)

目 录

译者前言	1
中译本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政治和社会	1
中国城市篇	3
论国家	9
历史和农业	18
文人空论	26
论责任观	35
儒教的改良	41
16 和 17 世纪的俱乐部、会社和协会	46
教育	51
第二章 人类学和宗教	75
蛮人的道德	76
化外人的形象	79
裸葬	86
5—10 世纪中国佛教徒的火殉	92
基督教在中国的同化问题	111
耶稣会士和中国人最初接触时的政治和宗教	115
第三章 思维方式	131
社会和思想的历史	133
论肉体 and 灵魂	145
静思法、宗教和哲学	151

王夫之(1619—1692)的哲学思想	162
读史法	169
论变的观念	174
中国和欧洲接触时的时间、空间、科学和宗教 (17—18 世纪)	181
第四章 文字	187
文字和历史	188
文字的心理作用及其特征	193
灵柩语录	205
《近海集》	210

第一章

政治和社会

本书的头两篇将论述中华文明一个伟大的、早熟的创造：国家，犹如抽象的实在，建筑在公私分明的基础上，又如自治组织和机构的结合，遵从客观的制度。奇特的事物，把中国置于我们试图认为正常状态之外：从希腊的波里斯 (polis) 到中世纪自由的维尔 (villes)，在我们那里起到重要作用的城市，在中国却不是由此形成政治权力的策源地。它本身可以说是外延的，非都市的，而是地域的。可以探索这个显著差异。中国肯定在公元前 5 和前 3 世纪之间，战国大变动时期出现这种权力构成的形式。诸侯牺牲与他们联姻的贵族拥有典礼和地域特权，以导向扩大自己的权力，用死刑禁止他们增强军事力量，及战胜敌人而获得丰富的农业储备。诸侯首先力图削弱这些家族在新征服土地上的影响，把土地直接由自己控制，正是这种将地方势力纳入整个侯国的新形式，其扩展成中国产生完全中央集权的国家，由朝廷任命的官员治理，付予薪资，而且按照职官制度予以升迁或贬黜。在某种背景及程度上，仍可能形成抗拒中央的核心，因此城市必须服从于国家。它必须容纳在利于治理的广大范围内，以致中国的基层单位是农村公社或乡镇，而不是城市。

然后农民的步卒代替了古代贵族的战车，同时土地耕垦、整治和分配，也有助于消灭古代的贵族，有助于国家的形成。公元前 221 年，古中国的侯国就这样最后合并于秦。然后每次在战乱或衰亡后重建，国家始终致力于防止大领地的建立；它经常关注的是保护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小农经济。但总的说未能做到这点。

公元前5到前3世纪之间列国战争的影响,使得从这个时期起谷物的种植占有优先地位(北方种小麦,南方种稻米),结果是农业日益发展、集中,最终达到园艺化。18世纪人口迅速大增长之后,这种农业使中国陷入危机:大约1800年,收成和长期可耕面积已达到极限,但人口还在不断增长。

在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历史中,有两个重要转变。首先,古代结束时出现过怀念旧制度的思想,其次国家衰亡后4个世纪,大贵族家庭治理,然后从中国第一次统一起,到6世纪末,大约一千年,中央集权政体牢固重建,它消除所有的监护,而且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这个新型的、本质非好战而系文明的国家,经历蒙古统治及明朝之治理(1368—1644),最后为草原部落传统和汉族传统奇妙结合的清朝(1644—1911)所继承。

国家一旦从军事贵族监护下解脱,其权力不断增强,制定更多的规章,越来越交由官吏治理。中央集权制和微弱的地方权力之间的不平衡,由过分集中及繁多规章造成的瘫痪,使18世纪的作者宣称支持地区自治,真正由地方而不是由国家任命的官吏治理。

中国社会总是防止犯罪,而不是施加镇压,采取教育方法,而不是严厉执法,用外交手段,而不是进行战争,妥协而减少冲突。理想之策是不战而胜。单独编纂有法典,但大多由当地风俗及公断处理事件。研究唐律可看出,中国是如何关注预防犯罪,在这方面即使稍有疏忽也会受惩罚。还有重视面子,这和我们和荣誉观很不相同,因为面子关系到每个人地位、身分的微妙感情。如果在对手前丢了面子,就会使事情陷入危境,不能得到和解。儿童时期已开始进行集体的伦理和道德教育,这在中国一直被认为人际间融洽相处的真正基础。

特别是从知识阶层发挥重要作用之时起,大约公元1000年,也就是我们称作新儒家时期,出现了旨在使社会普遍受伦理教育、广泛而严肃的启蒙运动,其地位在中国相当于西方的基督教运动。正是从这个时期起,因书籍刊印的普及、考试制度的扩大,上层人物的教育主要限于书本知识,同时强调克制欲

念、遵守个人纪律及自我批评。因此,这个运动对教育、书院、与教育有关的会社,以及对仕途有关的考试、会试制度等,都证明具有重要作用,总之中国社会大约从公元 1000 年起是一个发展的阶段。我们从中国学来考试、会试制,在中国也有我们在教育、文化及社会方面产生的副作用。

中国城市篇

本文为一次伊斯兰城市讨论会而作,其中所述内容也适用于与西方城市的历史对照。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极不相同:地理位置、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思想状态、集体历史经验,在这两种文化中都没有什么可比之处。然而正是深刻的差异有可能对它们作出显著的比较。

当游牧民来到中东许多城市门前,这一地区的生活方式常相混杂,不同于城市、农业及游牧的生活方式——这一特点,从某方面说必然感觉到城镇居民所体验的优越——这时,远东看来像欧亚大陆,一边是牧民的草原和商旅的沙漠,另一边则是已经整治和开垦的土地,二者截然分开。确实,区别并不都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北方存在着定居者和游牧者混合的活动地带。而且,面临饲养牲畜部落的场地、定居的耕作者、城池的建筑者,他们的领域则完全是文明的、开化的,并且有技术知识。同样的话适用于说明保护中国人对抗草原入侵者的墙垣及环绕城市的城池。况且在中国传统上,城市并不是显著的地方。它被具体定义为城墙内的地方,一般说是作为县政府的所在地,往往不能把城与其辖区分别开来。城乡对立不很明显,在宋代(960—1279)大商集团出现时,这点还没有觉察到。上层人物看来乐于居住在城里,但同样确实的是,贵族家庭及知识分子家庭并不都留恋都市,反过来中国城市长期庇护部分农业人口。

实际上,城的建筑是国家对交通、储备及主产品分配的保证,也是利于生产及防御敌人的整个大工程(道路、渠道、粮仓、堤岸、水池、工事……)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土地就这样全面得到安排,国家则为百姓提供普通住所。为什么城市在全国享有

特殊的利益？

这个帝国是由民政官治理，支配主要的财富。它占有丰足的谷物、纺织品、劳动力，管制货币流通、基本食品如盐等，以及金属制品，为官方市场规定物价，不许私商参与其中的交易。可以说，中国主要的商业产品，不是原产于都市，而是产于农村，如丝绸是在农村纺织的；另一方面，对原工场作坊施行管制。这些条件不利于都市商人阶层及自由匠人的发展。

由此可以说明，首先存在着一个奇特的矛盾：尽管城市有大量的贸易活动和可观的贸易额，城里有着财富及发达的技术，中国仍然较晚才认识到城市是一个特殊的实体，因人口密集，活动方式、生活状况及人口种类而有别于农村。

宋代大都市的居住者，作为市民，属于一个城市共同体的意识并不明显。而这种意识只是模糊的：从历史看，这是中国社会建立的另类群居、面积适当的形式。这种特殊社会形态，与中国总的政治结构有关，共同形成一个始终具有特色的整体，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对中国城市作具体的研究，肯定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们只对唐、宋的某些城市有所认识。此类城市是大都会，因而是特殊的城，但有其优点，大都会都是特别的城，在其他地方的城不会更具特色。

大约公元 600 年，长安（即西安，陕西省首府）和河南的洛阳是在恢复中央集权帝国的大背景下修建的，这关系到行政机构的重新设立、农业及财政的改良、刑法的再制定，以及市区、渠道和粮仓等大工程的建造。它们是大都城，为劳动者划定有区域。城内的市区、皇宫、行政区和居民区，都在城墙的环绕中。在各个细节上它们都与中国开始建立时传统类型的城相符。

我们仅限于谈长安城的例子。它的面积是 70 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巴黎城的面积），呈长方形，南北长度 8 公里余，东西近 10 公里。居住面积 50 平方公里，被三条交叉成直角的大道分开，划分为一百多个区，每个区本身再划分为更小的房群。这